

程超泽 著

中国经济： 增长的极限

资源：一个终极约束

世界话题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推力与拉力
过剩症候群

贫富缺口还在扩大
西部开发亟待解决的问题

地下经济无孔不入

国有资产在境外遁形
在体制空隙中寻租

转型期价值评判体系面临挑战

中国经济：

增长的极限

程超泽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程超泽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 - 5399 - 1850 - 0

(世界话题)

I . 中... II . 程... III . 经济增长 - 研究 - 中国
IV .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5129 号

书 名 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
作 者 程超泽
责任编辑 陈敏莉 王宏波
责任校对 碧 水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如皋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4 万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1850 - 0/I · 1751
定 价 1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绪 论

自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1978—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5%,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国家实力获得极大提高。中国已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6经济大国,而20年前的意大利则远远强于中国,是中国GDP的2.3倍。20年前,中国、墨西哥、西班牙、印度、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则分别是它们的2.5倍、1.6倍、2.3倍、2.3倍和2.1倍;20年前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87%,如今占3.28%;20年前中国只占世界头号强国美国GDP的7.45%,如今已上升到11.38%;20年的时间,世界GDP增长1.8倍,中国经济总量则奇迹般增长了3.9倍!

中国绝大部分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跃居世界前列。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等产品产量居世界第1位,茶叶、大豆、甘蔗居第3位。主要工业品中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产量居世界第1位,发电量、棉布、化学纤维居世界第2位,糖、原油分列第4、5位,其他产品的位次也明显提高。

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已由1978年的第32

位上升到了 2001 年的第 7 位。外汇储备也增加到了 2001 年的 1656 亿美元,居世界第 2 位。1950 年到 2000 年,中国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基本建设完成投资 9700 多亿元,更新改造完成投资 39700 多亿元。1950 年到 1999 年建成投产基本建设项目 70 万个,其中大中型项目约 6300 个。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独立的工业体系。中国的生产能力已大为增强。

20 世纪,中国在经受了长期艰难困苦后,终于得以从 70 年代末开始实现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有远见的“强国富民”战略,并显示赶超世界强国的勃勃雄心。1979 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平均 9% 的年增长率快速发展,这在历史上是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和前苏联在内的所有大国和地区都无可比拟的。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增。198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4517 亿元人民币,1990 年增加到 18558 亿元人民币,2000 年首次突破 1 万亿美元,整体经济实力在全世界排名已经上升到第 7 位。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海外舆论普遍预言,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将转而陷入困境或走向衰退。然而,20 世纪最后 3 年以及新世纪 2 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经济成功地抵御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峻的外部压力,依然保持了年平均 7% 以上的稳健增长,人民币汇率稳定,国民经济一派大好,在衰退的世界经济中,它被世人冠以“风景这边独好”、“一枝独秀”等美称。2001 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美国正在走向衰退的经济正式开始。然而,中国经济却继续在美国和世界经济寒风中热力不减。所有这些成功,首先得益于中国政府多年来启动内需所做出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人们很难想像,如果没有这样的决策,在过去的 2001 年,中国经济如何能从容地应对来自外部的

巨大压力。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外国康采恩到中国来投资还主要是为了躲避这个国家的高税收和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上立足的话,那么,现在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康采恩到中国投资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以便能从中国向世界市场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现在,中国可以提供使国际跨国企业家们心跳得更快的一切:廉价物美的的工作平台,不饱和的广大市场和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管理人员、知识型工作人员。

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邻国,都怀着一种复杂的心理来注视它们中间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2001年,中国吸收的外资占外国人在亚洲投资总额的 $\frac{3}{4}$,价值45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17%;而远东其他国家吸引的外国投资却减少5%以上。中国是亚洲和整个第三世界的绝对的比较级:更快、更便宜,也越来越更好。中国有足够的土地,足够的人力资源,中国能够生产一切,而且数量大,价格便宜。在北京中关村,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与美国和欧洲展开研究竞赛,上海的工程师在磁悬浮列车方面达到成批生产的水平,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已将其10%的研究转移到了中国,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多年来就一直在委托中国人维修其飞机,“中国制造”的彩电和空调设备已占世界总产量的 $\frac{1}{3}$,这个比例还在不断刷新。目前,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00家在华投资。这些公司在全球经济紧缩之际纷纷看好中国,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未来十年中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入国。新加坡总理吴作栋预言:“中国将以价廉物美的产品充斥世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实验场。近来,美国保护本国钢铁工业只是中国在今后十年中引起的全球经济变化的一个先兆。

笔者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将替代日本和韩国成为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从每年平均增长 16%,增至现在的 296 亿美元。中国的企业也更多地以投资者身份出现在那儿。中国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这个地区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贸易区,这个经济贸易区将作为一个统一体发展,促进区内经贸的发展,促进世界经贸的发展,并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共同联盟竞争。

由于中国的崛起,终于使得日本在过去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所谋求的建立亚洲经济集团的战略目标成为可能。这一次,亚洲突然真的认真对待区域经贸一体化问题了。十个东盟国家和中国之间关于计划最晚将在 2011 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显然,中国已从前 20 年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实惠,并已独辟了一条快速可持续发展的蹊径,由此朝前看,中国的前进步伐没有理由慢下来。过去 50 年,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可以相信,再有 50 年的发展至 2050 年,当迎来新中国百岁生日的时候,中国经济保守一些讲,也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因素:

(1) 在未来一长段时间内,除将长期保持国内安定团结局面外,还将有一个比较宽松、宜于发展的国际环境。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海峡两岸日益加强的经贸合作,将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近 20 年的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为中国未来阶段的发展提供

了必要物质条件,各项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加强,并在今后十多年内逐步发挥出巨大潜在效应,能源、交通等瓶颈制约将逐步缓解。

(3)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新的和更为有效的制度性基础。

(4) 有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供求总量和消费规模都将有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正处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巨大的消费需求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拉动力。

(5) 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形成的递推式区域增长模式,必然形成一浪推一浪长期增长的格局。

笔者进一步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结构剧烈变动时期,形成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契机。转变过程中资源配置等过渡性因素成为超常增长的主要成分,由此形成的快速增长是任何发达国家都望其项背的。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森等在《日本经济为什么增长这样快》一文中分析,日本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过渡性因素贡献占60%以上。也就是说,在10%的增长率中,就有6个百分点是这种超常增长因素造成的。这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速持续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启示。

许多发展中国家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努力久难奏效,长期被排斥在发达社会之外,其通常存在的障碍可被解释成:(1)贫困恶性循环,在进入工业化过程中,穷国很难解决提高资金积累率问题。(2)小国劣势,资源匮乏,市场狭小。(3)内战、持续暴乱、政府更迭频繁、外来入侵等等,使国内外投资者因风险太大望而却步。(4)经济发展动力不足。(5)不利的国际大环境,包括国际贸易障碍,与发达国家进行的不平等贸易。(6)吸收现代

科学和管理技术能力不足。^①试想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自身资本积累能力低、政局不稳、合乎要求的劳动力和科技人才稀缺、国内市场狭小等情况下,国际资本恐怕很难成为其国内资本的替代,这类国家往往被认为是“无希望”的落后国家。中国的工业发展固然存在着许多困难,然而上述发展经济学认为的诸种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构成威胁的障碍,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

积累率高。中国的高积累率在低收入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已执行过的9个“五年计划”中,有4个时期的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30%以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从国民收入中获取的财政收入及相应用于积累的财政支出比例持续下降,然而整个积累率却没有下降。这段时期的高积累与前30年有不同含义:如果说以往是靠中央集权维持的“强迫储蓄”,那么现在的“自愿储蓄”则占相当高比例。可以比较放心地认为,无论中国体制改革推进的程度如何,中国不会陷入储蓄率过低这种经济发展的常见困境之中。

经济发展动力很强。中国传统较强发展动力(表现为“过热”的投资欲望)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体制现象,不利于经济发展。然而,近十多年中国工业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强动力显然不能光用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近些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只有不到10%是国家预算内投资,其余的均为市场导向性很强的各类贷款和自筹资金。那些基本上游离于原来计划体制外的经济主体表现出极强的增长欲望,如乡镇企业、村办企业、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

^① 【美】查尔斯·K. 威尔伯,《发达与欠发达的政治经济学》,纽约:蓝登出版社,1979年。

业等等,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增长速度。人们从事工业活动的成就愈来愈得到社会尊重和赞赏,处于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寻找投资机会,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对这种动力有所约束。

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丰富的资源已逐步得到开发,基础产业如粮、棉、煤、铁、石油、电力等产量均居于世界前列,使中国经济具备较强的自主发展动力。仅在改革和发展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就达 1400 多亿元。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倾斜和投资结构的改善使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运输邮电业等国民经济瓶颈产业得到大大缓解。

国内政局稳定。中国经济起飞适逢代际领导人的交替。邓小平的逝世已表明,中国已从“邓小平时代”步向“邓后时代”。在这一过程中,老人政治色彩将逐步淡化,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力在邓小平去世之前实际已得到巩固,权力移交中没有任何震荡,改革也在按照既定方向推进中进行。在过去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一条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具有了一种自我增长的基本冲动与机制。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只要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中国经济便会以相当迅速的速度向前发展。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对缓解各种社会矛盾提供较大可能性。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空前稳定局面,人民休养生息。

经济主义话语已成为一种社会极具支配力量的社会定势和社会判断。“在这个话语之中,只有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事物,特别是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相联系的事物才具正当性,才有存在价值。相反,一种要求即使是体现了文明进步要求的诉求,如果不是与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提高相联系的,也难以获得其正当性

和合法性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现实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一是‘稳定’价值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人们所接受。稳定的价值是与经济主义的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二是民主主义话语的相对弱化。正是这样两个条件的结合,使得我们大体可以判断,在邓后时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将会以一种相对平稳的方式推进。”^①

科学技术和管理能力较强。中国的教育普及率及科技人员占总人口比重在低收入国家中是名列前茅的。2000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7.1%,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升学率达70.4%。中国现仅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的人员就有960万人,全国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有5700个。中国科学技术能力不仅表现为人员多,而且表现为研究和开发能力强。它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外层空间开发技术的国家之一,是少数在南极建立永久性观测站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应用技术开发能力也较强。但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远没有在生产中得到普及,生产领域的新技术浪潮尚未形成。许多企业仍在用较低技术水平进行生产,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科学技术尚未大面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也正好说明了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巨大增长潜力。一旦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得到大规模普及和应用,中国经济无疑将获得巨量增长。

拥有世界上最为廉价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据统计,中国的劳动力总量约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30%,不存在前苏联和东欧、中东那样限制经济发展的劳动力瓶颈。除了集约化发展以外,中国还可以进行粗放型发展。中国工资水平大约是日、美等发达国

^① 《中国经济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家的三十分之一,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十分之一。工资费用低廉,产品生产成本必然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今后,除特区、开发区和前沿开放区外,就全国整体来讲,劳动成本费用低廉的优势将长期保持。从世界经济发展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商品交换中有长期存在基础,即使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品总是需要的。负责全球战略研究的著名摩根·斯坦利公司的一个分析家小组宣布,中国“将是今后十年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地方”。

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经济的重要支持。中国有5千5百万华侨华人,这一数字与意大利、英国、法国等中等规模人口国家相当。其中,外籍华人3千多万,拥有3千亿美元资本,在世界上被称为与犹太资本、阿拉伯资本并驾齐驱的三大金融力量之一。受世界经济国际化与区域集团化双重发展驱动,在变异中传承的“五缘”文化^①凝聚力的催化下,海外华人在资本、技术、管理和发展经验上对改革开放中的祖国经济腾飞给予了重要支持。据估计,目前中国的外资中80%来自海外,特别是来自香港、台湾、澳门等地。

经济持续增长的梯度区域格局已基本形成。在全国各地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已形成沿海、沿江、沿边、沿重要交通干线、具备良好发展条件的10大经济热点地区,这将对全国国民经济的影 响、贡献度和带动作用产生深远影响。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国际资本正积极拓展这个中国最发达的投资市场。其次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特区政策得以保留,并在加快体制政策、加强区域规划等方面创造新的区域优势,经济增速继续居于全国前列。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广东跟香港经济联系更加密切,

^① 五缘指的是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

外向型经济得到更快发展。渤海地区也将是重要经济热点地区,在未来几年内,环渤海地区的能源、钢铁、石油化工、重型机械工业以及汽车、电子和高新技术产业将有较快发展,产业结构逐步协调,经济发展后劲增强。武汉的黄石地区,利用三峡工程和已有的产业基础,冶金、汽车、机械、化工、建材、纺织、食品等都将得到加强,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有较大发展,承东启西,辐射南北的作用更加突出。皖江的昌(南昌)九(九江)地区,利用新开通的京九铁路、沿江铁路和长江运输,生产布局重点转向沿线和沿江地区。成(成都)渝(重庆)地区将成为西部经济发展先行区。成都将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基于传统工业和科技优势,西安的关中地区已成为国家大规模开发大西北的桥头堡。南宁的北部湾因为南昆铁路的开通将成为新的经济热点。以兰州为中心的黄河上游地区,将以水电站开发为主,有色金属、电力、冶金、加工业综合生产基地初具规模,为今后大规模开发西部地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有一个较有凝聚力、较有威信的中心政府。这一政府获得了较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具有能够有效动员和利用全社会各种资源的能力与力量,从而为特定工业化战略目标服务。库兹涅茨在其名著《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根据众多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指出:“现代经济增长、连同它持续的技术和社会革新及其结构变动的高速度一起,需要一个国家基础来作为公证人,和平疏导变化,并为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承担直接责任,一系列的进一步后果就继之而起”,“主权国家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①经济高速

^① 李京文,《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经济》,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年,第 34—35 页。

发展客观上需要国家集中使用资源能力和力量,以便进行为未来经济增速的巨型工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而公有制经济基础更为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高投入和结构调整,无疑也为其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潜在的有着 13 亿人口的巨大市场需求,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持久和强劲的拉动。40%左右的高储蓄率和迄今为止民间近 8 万亿人民币的高储蓄,使投资率一直保持在 33% 以上的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善,将进一步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活力和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现实地加入 WTO,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日益融合,将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更大更长时期的回旋空间。

总之,21 世纪的中国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具全局性影响的自然灾害,没有大的社会动荡,中国强劲的经济高速增长可望持续至少 30 年,届时,这个国家可望发生沧海桑田般的巨变。然而,对中国 21 世纪现代化的预测,毕竟不是等待未来美好许诺的一种自然实现。在中国面向 21 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世界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剧烈竞争和严峻挑战,其社会内部深刻的变革也将呈现出多重危机和困境。

中国经济无疑是在一个较低起点上起飞的,是在工业化、现代化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远不如当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下发动的。由于中国发动工业化时间晚,起点低,受到各种因素限制,它的发展不仅任务繁重,而且发展过程漫长。

学者张培刚教授认为,影响现代化过程最重要的因素有 5 个:
(1) 人口数量、人口构成及人口地理分布;(2) 资源或物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 社会制度,即人的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

分配；(4) 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应用；(5) 企业创新管理才能，也就是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或应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① 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成员胡鞍钢认为，由于一国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不同，例如人口众多的大国与人口稀少的小国，资源丰富国与资源匮乏国，大陆型国家与海岛型国家，市场经济国家与计划经济国家，等等，上述发动因素和制约因素有不同特点。这些因素既会影响一国进入现代经济发展机会，也会影响一国现代经济发展的进程。^②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是什么？它具有什么样的国情特征？这些国情特征又是怎样受到影响和限制的？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经济起飞时间晚。中国经济起飞的时间比西方要晚二百多年，是在 1980 年以后真正开始的。在西方已率先完成近代化、现代化经济起飞，占领了大部分世界市场的不利条件下，中国经济起飞过程才开始。那些工业化国家发动工业化时就积极参与了国际贸易，与世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以血与火的战争和殖民地方式积累了大量原始工业资本和资源，靠着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两个轮子促使经济起飞。中国自 19 世纪中叶发生鸦片战争以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下不可能实行显著的社会变革，一直闭关锁国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开始改变，从而坐失了世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使用廉价的不可再生性资源、特别是石油的黄金时机。当对外开放国门打开时，国际市场早已瓜分完毕，以初级产品（大都是资源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又使中国处于极为不利地

①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年。

② 胡鞍钢，《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6 页。

位。同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第四次经济长波的下波期(从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从而从外部限制了中国经济的起飞。

工业化起点低。作为较晚加入现代化进程国家之一,中国在其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遇到了与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条件和增长机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国际比较:欧美各国的工业化大体始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下半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则是从19世纪中叶才开始解体,直到20世纪中叶才开始进入工业化发动阶段。但是,国内五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一再打乱了初期工业化进程。因此,中国比工业化国家大约晚了150—200年时间。目前,中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其生产技术水平和开发利用资源能力的差距甚大,中国虽拥有后发优势,但障碍重重。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人均产值起点高(约在200—250美元)(按照1965年价格),美国为474美元,加拿大为508美元,只有日本除外,为74美元。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时的人均GNP只有250美元左右(1980年的不变价格)。从产业结构看,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结构变动起点高,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在30%—60%之间,农业产值占GNP比重在40%左右。而中国20世纪80年代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仍高达70%以上,农业产值占GNP比重为50%,分别比当时工业化国家高出几十个百分点。

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集中。中国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起飞、90年代的经济加速,是在没有真正完成近代工业化起飞的历史前提下,借助于现代科技革命的全球浪潮、全球一体化和后发优势直接开始现代化起飞过程的。经济体制改革本来应当是现代化起飞助跑阶段的历

史任务,中国因缺少直接助跑期,因而将体制关键期、经济发展起飞期和社会现代化临界期三大经济转型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起飞过程的特殊性、复杂性和综合性。两次起飞二合一以及体制关键期、经济发展起飞期、社会现代化临界期的三合一,使起飞过程特别猛烈,各种矛盾特别丰富、特别集中、特别复杂、特别深刻,有时有些矛盾还表现得特别尖锐和突出。

面临着艰难困苦的体制转型期。中国的经济改革推进到今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一些明显存在的问题构成了强烈的挑战:一类是社会性问题,如贫富悬殊,工人的失业,农民的贫困,官员的腐败等问题;另一类是体制建设的挑战。由于利益分化,相对立的社会力量的成长,以及社会多元性的发展,需要以具有容纳能力的制度安排做出响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将更多地进入到制度建设阶段。在社会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将会遇到主流文明形成过程中曾经遇到过的一切问题。在中国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类似于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又具有自我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一种以法制与法律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如何建立一种能够有效沟通国家与民族、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并能够具有较高效率的、体现宪政精神的政治和政府体制,如何在保证社会总体进步,同时最大限度保护个人自由,如何建立一种使科学和理性精神能够正常发育和存在的人文环境。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体制转型中必将会遇到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人口众多,近 13 亿人口中有 9 亿农村人口。劳动力资源丰富,人民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著称于世,但文化、技术素质低,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困难。经济建设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经济总量有望进入世界前列,但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居世界后列。多项